

# 国际政治学视阈下的巴以关系<sup>\*</sup>

曹 兴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国际政治学视角对巴以关系的根源及其未来走向进行了解析。巴以冲突的根源是地缘民族政治和国际大国强权政治双重积压的灾难。未来巴以地区必将是地缘民族政治、国际强权政治和全球政治三管齐下的结果。一方面,巴以关系的和平曙光不能寄希望于巴以双方的民族立场和大国强权政治的国家立场;另一方面只有在全球政治引领下,巴以关系才能走出民族政治和国家政治参与的误区。问题的关键是,要想解决诸如巴以冲突这类世界性的难题,必须走出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局限性,站在全球利益的高度。

**关键词** 巴以冲突 地缘政治 民族利益 国家利益 全球利益

本文试图从三个角度来解析巴以问题:从地缘政治和民族利益的角度,解析巴以地区缘何成为地球文明的“心脏病效应”;从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和国家利益的视角,解析巴以问题的被挤压效应;从全球利益和全球政治角度,解析巴以地区的未来走向。

## 一、从群体利益关系解析巴以冲突的症结

巴以地区何以经久不衰地成为人类的重灾区?古代这里经历了希伯来人(犹太人的祖先)的一次又一次的民族灾难和十字军东征血与火的洗礼,近代则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排犹浪潮,现代又经受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战争苦难,巴以和平路线蓝图何时能够变成现实?对上述问题,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可谓见仁见智、精彩纷呈。

对于巴以冲突的性质,有的学者把其归结为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末世论;<sup>①</sup>有的学者认为巴以战争不是文明冲突,而是民族冲突;<sup>②</sup>有的学者认为巴以冲突是种族主义的一种表现;<sup>③</sup>有的学者则把巴以冲突定性为一种宗教冲突。<sup>④</sup>其实,巴以冲突的深层原因是利益冲突。

学者对巴以冲突研究最多的是巴以冲突的原因和根源。有的学者认识到,巴以争端久拖不决的原因的复杂性包括犹太人定居点、难民问题、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等,都是棘手的问题;<sup>⑤</sup>有的学者认为,巴以冲突的原因除了边界划分、水资源分配、圣城耶路撒冷归属、巴难民回归等诸多棘手的问题外,还有以色列当局的逆向思维、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和阿拉伯世界自身的弱点;<sup>⑥</sup>

<sup>\*</sup> 本文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权与国际事务”交叉学科建设项目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① 汪舒明《末世论和全球社会政治冲突——以巴以冲突为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1期。

② 赵灵敏《巴以战争不是文明冲突》,载《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2期。

③ 汪民安《生命权力、种族主义和巴以冲突》,载《读书》2002年第9期。

④ 陈颖《浅析巴以冲突中的宗教因素》,载《科学与无神论》2007年第1期。

⑤ 朱应鹿《对巴以冲突及其前景的几点思考》,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4期。

⑥ 马明良《巴以冲突症结分析》,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

有的关注了巴以冲突的政治原因;<sup>①</sup>而有的则从经济视角提出双方的经济差距由此越来越大,认为这种差距不仅仅是巴以冲突的结果,更是引发双方冲突的导火线和原因;<sup>②</sup>有的探讨了巴以冲突影响下的以色列民族关系,认为以色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长期的敌视与怀疑,不仅有害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也不利于以色列国内的民族团结;<sup>③</sup>有的分析了解决巴以冲突的困难来自巴以内部和外部;<sup>④</sup>有的学者探讨了影响巴以冲突的美国因素;<sup>⑤</sup>而有的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探析了巴以冲突。<sup>⑥</sup>其实,归根结底,巴以冲突不过是各种群体利益冲突的结果。

关于巴以冲突的未来走向,学界更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欧盟依靠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对解决巴以冲突将会发挥重要作用。<sup>⑦</sup>有的学者,从联合国有关决议、领导机构、主要对抗方式、军力对比、外交与国际环境、社会发展状况、民众意愿七大因素,研究了巴以冲突未来发展态势;<sup>⑧</sup>有的学者从现代化视角分析,认为巴以冲突是巴勒斯坦和犹太两大民族现代化的矛盾,从长远来看,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以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的现代化权利为前提;<sup>⑨</sup>有的认为解决巴以冲突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sup>⑩</sup>有的说巴以冲突是当今世界上最难解的问题之一。<sup>⑪</sup>其实,巴以冲突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民族国家利益冲突的化解。

总之,巴以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巴以冲突的性质、原因及其未来走向;民族学者从民族学角度看,认为巴以冲突是民族灾难。宗教学者则从宗教学角度看,认为巴以冲突则是宗教灾难。国内著名学者牟钟鉴和张践先生提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出于一神论的偏执,因此导致严重的宗教冲突,巴以冲突是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冲突的一个典型。<sup>⑫</sup>

然而,众多学者的探索大多流于现象层面的分析,更多的解析是对巴以冲突表层原因的研究,缺少本质原因即利益层面的分析。其实,巴以冲突的本质原因是多重利益关系合力的结果。揭开巴以冲突的神秘面纱,需要从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对其进行利益关系的解析。本文重点从国际关系学对上述问题进行解析,认为巴以冲突是特殊地缘政治和大国政治博弈的产物,是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双重挤压的结果。

## 二、从民族利益和地缘政治看巴以地区文明“心脏病”效应

从地缘政治的民族利益角度来解析巴以冲突不失为一个重要视角。巴以地区是当今世界上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最为严重的地区。从巴以冲突的现象看,巴以冲突是国际地缘政治,确切地说是国际地缘政治追求民族利益造成的。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巴以问题是基于追求民族利益,表现为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联合打造的严重问题,是国际地缘政治追求民族利益的重要表现。因此,离开民族政治和民族利益的思路,无法解开巴以问题之谜。

① 胡洁《巴以冲突背后的政治角逐》,载《党政论坛》(干部文摘)2009年第2期。

② 虞卫东《试析巴以冲突的经济内涵——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经济的全面控制谈起》,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1期。

③ 王瑞《巴以冲突影响下的以色列民族关系》,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9期。

④ 杨福昌《解决巴以冲突的难点及其相关思考》,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3期。

⑤ 赵玉山《论巴以冲突中的美国因素》,载《吉林教育》(教科版)2007年第12期。

⑥ 王新国、蔡昌卓《后冷战初期美国国家利益与巴以冲突》,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

⑦ 林燕《欧盟在巴以冲突中的外交政策》,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

⑧ 王京烈《巴以冲突:主要影响因素及预测分析》,载《西亚非洲》2003年第5期。

⑨ 陈天社《现代化与巴以冲突》,载《长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⑩ 安维华《巴以冲突中各种力量的互动》,载《西亚非洲》2002年第3期。

⑪ 曹兴《从民族冲突类型看巴以冲突的根源与走向》,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期。

⑫ 牟钟鉴主编《民族宗教学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41—142页。

巴以地区的是非之争有其历史渊源。这个地区是多种文明的汇聚与交界的地区,早在古代就是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角逐与交锋频繁的地区。在氏族社会发展时代,人类社会大都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而且社会成员的数量也很有限,<sup>①</sup>很少发生大规模文明互动。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后,社会规模急剧放大,并在国际社会舞台形成帝国争霸的局面,欧、亚、非三大洲交界的地区即巴以地区遂成为各大文明角力和争锋的角斗场。因此,如果把早期人类文明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的话,那么中东地区就是这个有机体的心脏,巴以地区就是人类文明“心脏”的“心血管”。由于这个“心血管”过分狭窄,使得人类文明生命体的心脏地区不堪重负。

据人类学家和史学家考证,中东成为早期传播农业文明的中心。<sup>②</sup>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对巴以地区相继发生了重要作用。按照本文理论的解析就是:由于巴以地区地处欧、亚、非三大文明的中枢地带,三大洲的强势文明都对巴勒斯坦地区<sup>③</sup>产生巨大影响。受迫于埃及文明施加的压力,发生了犹太人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出走埃及”。后来,巴比伦文明对犹太人的影响,造成了犹太人历史上更加著名的“巴比伦之囚”悲剧。伊斯兰文明崛起之后,希伯来人<sup>④</sup>又被崛起的穆斯林赶出自己的故乡,四处流散(主要流向欧洲)。公元11—13世纪发生了持续约200年的宗教战争(十字军东侵)<sup>⑤</sup>,犹太人在此期间只能在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角斗的夹缝中生存。时至近代,犹太人成为欧洲人排挤的民族。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了500多万犹太人,成为欧洲人排犹的一个极端。在这种背景下,欧洲人为了解决犹太人问题,在英、美强国的支持下,支持犹太人返回故乡,完成犹太人的复国大业。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遭到了阿拉伯人的四面围剿,巴以地区的民族冲突陡然升级。

不同民族的文明各有差异,但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希伯来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不仅参与了人类农业文明源头的创造,<sup>⑥</sup>还为人类贡献了三大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sup>⑦</sup>犹太人为世界贡献的思想家也是人口比例最高的,不仅有社会主义伟大导师马克思,还有自然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人物马尔库塞等,数不胜数。然而,犹太人却遭受了接连不断的历史磨难,民族发展过程艰难而曲折。不难断定,这既与巴以地区的文明机体“心血管狭窄”现象有很大关系,也与犹太文明体(虽小却有强大内涵)受到周边各大民族文明体形成的挤压现象有关。

从古代的十字军东侵到近代的排犹浪潮再到现代的阿以冲突及巴以冲突的发展道路中,还有一种深层的文明关系问题,即特殊的利益冲突。《圣经》启示,巴勒斯坦地区是一块“流奶与蜜”的福地。<sup>⑧</sup>“奶与蜜”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奶”代表文明的滋养,而“蜜”代表

① 据人类学家考证,人类社会早期的最少数量大约只有30至100人。详见 Christopher R. Decorse, *Anthropology: A Global Perspective*, third edition,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1998, p. 118.

② 详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③ 在当时还不能称为巴以地区,只能称为以色列地区。

④ 希伯来人是古代犹太人的称谓。

⑤ 西方人称为十字军东征。它是西欧天主教国家对地中海东岸的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宗教性战争,主要目的是为了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罗马天主教圣城耶路撒冷。

⑥ 从人类学视角看,巴以是人类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从这个角度看,可以把巴以看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心脏地区。

⑦ 宗教学界已经达成一个共识,认为如果从源流关系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从犹太教分流发展出来的世界性宗教,都是属于亚伯拉罕谱系的一神教。详见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50—655、668—672页;牟钟鉴主编《民族宗教学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⑧ 《圣经》中有二十多次提到“流奶与蜜”,第一次出现于《出埃及记》(3:8):“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最后一次出现于《阿摩司书》(9:13):“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

着文明生命的美好和甜蜜。从历史角度看,巴勒斯坦这块“福地”是多民族、多文明争夺的“是非之地”。从地缘政治上看,巴勒斯坦这块“福地”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处,三大洲文明在此地频繁接触和碰撞,决定了该地必然成为各大文明角逐的场所和兵家必争之地。从经济利益上看,中东地区潜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为工业文明必须的“奶与蜜”。中东地区历史悠久,各种民族文化积淀深厚。从阿以冲突到巴以冲突,再到巴勒斯坦的建国问题,再到黎以冲突的历史发展轨迹,既隐含文明碰撞关系,也凸显了特殊利益冲突下的博弈。

从民族学视角看,巴以地区狭窄的特殊地理结构决定了该地是无法培育出大民族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依托此地之上的民族的发展轨迹。一般而言,小民族是不足以与大民族相抗争的。但是,地缘政治因素在民族纷争中通常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变量因素。就犹太人而言,无论是古代的希伯来人,还是发展到近现代的犹太人,都不能说一个大民族,在“丛林法则”和极端统治下是难逃历史厄运的。以色列建国至今,虽然身处周围阿拉伯人的包围之中,但因得到美国中东战略的强力支持,使得以色列犹太人在阿以冲突中确立了强势民族地位。

就巴勒斯坦人而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决定了巴勒斯坦人也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巴勒斯坦人只是阿拉伯人的一个分支。阿拉伯人的不团结造就了中东的分裂。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出于民族自我保护,<sup>①</sup>退出了阿以争端,使得巴勒斯坦人孤军奋战。在这种形势下,面对背后有美国“永久性”支持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根本不是对手,处于绝对劣势。

总之,在巴以土地上,犹太人是绝对强势民族,巴以冲突的命运天平自然向以色列倾斜,悲惨的命运必然降落在巴勒斯坦人的头上。

### 三、从“强权政治”下的国家利益看巴以关系

国际关系学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相关的政治取决于相关的利益。因此,民族利益决定民族政治,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政治,全球利益决定全球政治。站在这个角度上解析巴以关系,许多现象就会一目了然。美国一再偏袒以色列,是出于国家利益,目的是“巩固其有利地位,强化其对世界的主导权”。<sup>②</sup>

把视野放大,不难看到巴以地区不仅是国际地缘政治和民族利益纷争的问题,更是国际强权政治下国家利益纷争的产物:在以色列从英美扶植复国到巴以冲突的现代史,美国对以色列的一再偏袒;巴勒斯坦从领土完整到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自保,再沦为可怜地不断“以土地换和平”的悲惨命运,不难看出巴以地区的局势已经不再单纯是巴以双方所能左右的,国际上的一些大国出于自身利益对巴以的不平等干预,对该地区的冲突局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没有理由认定犹太人是巴勒斯坦地区的最早原居民。其实,追本溯源地看,巴勒斯坦地区的最早原居民并不是犹太人,而是迦南人。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于公元前18世纪才来到这里,后来于公元前11世纪才建立了希伯来王国。<sup>③</sup>再后来由于被巴比伦的放逐、罗马帝国的镇压,公元1世纪,犹太人几乎全部离开了巴勒斯坦地区,流落到世界各地。据专家考证,公元640年,阿拉伯人统治此地时,犹太人还不足50人,即便到了1882年,犹太人也不过2.4万人。<sup>④</sup>阿以冲突只是近代犹太复国主义的结果。

① 运用国际关系学理论分析,这是威斯特发里亚体系的必然产物:在国家主权至上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指导下,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保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战略,对内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外确保国家安全。

② 俞正樑《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③ 金宜九、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298页。

④ 陈建明《当代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3、84页。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最初是在世界各地反犹、排犹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流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在长期受压下梦想返回自己的故乡,重建犹太王国,这是一种宗教及民族主义的意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是一种号召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返回故土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国家的政治思潮及其以这种思潮为目标的运动”。<sup>①</sup> 19世纪,随着犹太人获得公民权及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犹太复国主义开始走向政治化。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人物摩西·赫斯尔(Moses Hess, 1821—1875年)及利奥·平斯克(Leo Pinsker, 1821—1891年),号召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宣传锡安主义(Zionism)。20世纪初,欧洲一些国家再度兴起反犹运动,致使政治化的犹太复国主义进一步高涨,欧洲的犹太人开始移民巴勒斯坦。1917年,英国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表《贝尔福宣言》,赞同并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sup>②</sup> 联合国建立后,犹太人的故乡巴勒斯坦地区是联合国的托管区。1945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议,让10万犹太人进入这一托管地区。1946年4月,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提出了赞成杜鲁门的建议。然而阿拉伯人却极力反对,甚至提出严重警告,如果必要的话,阿拉伯人将不惜付诸武力阻止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流入。这样,联合国派了一个实情调查委员会前往巴勒斯坦。该委员会在调查后递交了一份建议把巴勒斯坦进行分治的报告。在联合国收到该委员会的报告后,1947年11月29日投票赞成这一报告。1948年5月14日,犹太人根据这一分治决议,宣布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即以色列。

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阿拉伯人便采取了军事行动。虽然双方都是为了各自的生存而战,但犹太人捍卫国家的意志更加强烈。犹太人受到西方人的军事支持,加上阿拉伯人缺乏有效的统一的军事领导,结果犹太人击败了来自西面八方的阿拉伯人的进攻,而且还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可以说,以色列在一些西方大国的支持下,一开始就奉行扩张领土的政策,破坏了联合国的决议,利用军事手段向四周阿拉伯各国发动战争,占领了大片的土地,遭到阿拉伯各国与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坚决反对与斗争。

在阿拉伯人最初经过两次失败的停战之后,阿拉伯人与以色列终于在1949年2月7日签订了停战协议。然而,停战并未带来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和解。这是因为阿以双方面临着两大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难民问题,一是边界问题。首先中东地区面临着如何处理近100万从以色列逃出来的阿拉伯难民问题。这些难民一直住在以色列边界附近简陋的难民营里。阿拉伯国家坚决要求让这些难民返回其原来的家园,而以色列则坚决反对。以色列人认为,这些难民是以色列的反对者,如果允许他们返回以色列,他们必将毁掉以色列这个新建的国家。

经过巴勒斯坦人的努力,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于1988年11月宣告成立巴勒斯坦国,但大片土地仍处在以色列的占领下。在西方大国尤其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人并没有归还土地的意愿。在西方大国和以色列的强势压力下,巴勒斯坦人还在可怜巴巴地“用土地换和平”。21世纪初,由于“9·11”事件,以色列当局打起“反恐”旗帜,将巴方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斗争划入“恐怖主义行列”,扩大了对巴军打击的规模,增加了巴以和平进程的难度。<sup>③</sup>

综上所述,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局势主要是国际地缘政治和国际强权政治双重挤压的结果,也是该地区的民族利益和国际强权政治的国家利益双重影响的产物。昔日巴以地区的“心脏血管狭窄”效应,在当代又增加了国际强权政治的影响要素,使得巴以问题不单纯是地缘政治问题,而进一步演变成为国际强权政治冲突的一个缩影。巴以局势是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一个杰作,<sup>④</sup> 巴以

① 徐新、凌继尧《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8页。

② 尹崇敬《中东问题100年》,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③ 陈双庆、赵宏图《中东和平进程面临严峻考验》,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期。

④ 其中的深层价值详见后面对威斯特发里亚和约意义的分析。

冲突是以国家利益为轴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种特殊的表现。1648年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宣告了帝国称霸的失败。<sup>①</sup>这个和约主张用“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来构建世界上国家体制的问题,标志着国家掌控内部事务及对外独立的胜利,圈定了新的国家社会的政治准则为全欧洲提供了一部根本性与全面性的宪章,开创了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关系的格局。

从地缘民族政治和国际强权政治的双重角度,虽然足以解析现代巴以问题的双重政治挤压效应,但还不足以解析巴以关系的未来走向。要想从根本上找到巴以冲突的和平路线及其未来希望,必须站在全球政治和全球利益的高度。

#### 四、从全球利益看巴以未来走向

如果仅从地缘政治和国际强权政治两个视角看,巴以冲突的未来毫无希望,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被国际地缘政治和国际强权政治双重伤害的必然结果。如果这双重压力并未削减,那么巴以局势只能继续沿着更加悲惨的命运发展下去。

从根本上说,给巴以地区未来带来和平希望的曙光决不是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而是姗姗来迟的全球利益,因为全球利益的政治目标不是为了解决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而是全球问题。因此,像兼具地区性与全球性问题的巴以冲突,是不能单纯依靠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来寻求出路的,只有靠基于追求全球利益的全球政治才能解决。

从国际关系视角分析,人类族体利益经历了从民族利益发展到国家利益再发展到全球利益的时代,相应的世界政治经历了从民族政治时代发展到国家政治时代再发展为全球政治时代。从古代氏族社会发展到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前,世界政治是处于单纯民族政治的发展时代,虽然有过帝国文明的发展,但世界主要还处在各自为政的发展阶段。而后,近代民族国家运动开启了国家政治的发展时代,建立了威斯特发里亚框架的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在第二个阶段,列强成为主导世界的霸主角,殖民主义运动遍布世界。在列强之间奉行的是国家主权至上的国家政治理念,国际关系推行的是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正如卢梭分析的那样,“丛林法则”推行的是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法则,强势国家处于支配地位,弱小国家被迫居于依附地位。<sup>②</sup>诸多列强国家之间奉行的是威斯特发里亚和约体制,即反对一国独霸世界的均势体制。<sup>③</sup>冷战时代的苏美两霸和冷战后美国试图独霸“武林”,并未能从整体上打破追求均势的世界民族国家体系。

上世纪60年代以后,威斯特发里亚体制受到严重挑战,国际政治的发展开启了后威斯特发里亚体系的发展时代。有的国内学者把这种后威斯特发里亚体制时代称为是全球共治体系。<sup>④</sup>其实,后威斯特发里亚体制时代就是全球政治兴起、追求全球利益的发展时代。

全球利益和全球政治的出现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在全球政治发展中,国际关系的历史开启了从主权至上转向人权至上、从国家中心转向人类中心的发展新阶段,进而开启了解决全球问题从国家治理平台向全球治理平台的转变。以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上看,政治的领土化、主权的至上性和国家中心主义,成为支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三大支柱”。<sup>⑤</sup>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组

① (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著,吴勇、宋德星译《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② 详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俞正樑在《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页)一书中,明确概括了这一现象。

③ 例如:称霸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战败,签订了《威斯特发里亚和约》,宣告了帝国称霸的失败。后来国际政治舞台上不断上演阻止称霸的事例,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61—1714年)企图称霸,但被英国荷兰联军阻止了;拿破仑(1795—1815年)企图称霸,被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四国阻止了;希特勒(1939—1945年)企图称霸,被美国、苏联与英国阻止了。

④ 俞正樑《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⑤ 蔡拓《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0页。

织、跨国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国际行为的不断活跃,国际关系内容和国际议题日益丰富并多样化,人类开始进入到多元政治议题和多种国际机制并存互动的政治发展阶段。在这种国际政治格局下,全球理念超越了国家中心主义,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了从国家政治、国际政治、世界政治向全球政治的跃升,真正实现了政治向全球的扩展”。<sup>①</sup>传统政治的利益驱动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而全球政治所追求的利益价值导向则是人类中心而不再是国家中心。全球政治关注和追求的是人类共同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遵循的伦理价值是全球伦理,<sup>②</sup>而不是国家伦理。当然,这种转变不单纯停留在理论上的转变,已经演变为现实政治发展的某种趋向。

虽然全球政治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就会退出国际政治舞台,甚至不能否定国家利益依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利益基石,国家政治依然是当今国际舞台的主流政治。<sup>③</sup>但不可否认,追求全球利益的全球政治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从国家政治向全球政治发展的这种“趋向还远未发展为主流,甚至以若隐若现的形式存在,但它们完全反映着全球政治的新质”。<sup>④</sup>

因此,影响当今世界国际社会的政治因素有三个变量,即民族政治、国家政治和全球政治,它们分别取决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其中,民族利益和民族政治对国际社会的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强国或列强政治对国际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可以说,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以及民族政治和国家政治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合力打造的国际悲剧则是其负面的表现,包括巴以冲突、印巴冲突、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等世界热点问题。

由于民族政治基于民族利益,国家政治基于国家利益,分别对国际政治施加影响,因此,从负面影响角度看,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对于巴以冲突的缓解并不太有利。惟有全球政治才会从另外甚至是相反方向对巴以冲突施加正面影响,既不从民族利益出发,也不从国家利益出发,而是从解决全球问题角度,从追求全球利益的立场出发,才更有利于巴以冲突的缓解。

把这个理论落实到解析巴以冲突的未来走向,展现其和平曙光的理由就是:一方面,基于民族国家利益决定国际社会的原理,巴以双方会继续追求民族国家利益,偏袒以色列的美国等世界强国也会继续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两种民族国家利益的追求并非有利于巴以冲突的缓解。由于美国出于其国家利益,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隐性联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巴以局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决定巴以从连年战事走向整体和平的局势还要经过漫漫长路,也说明片面地追求民族国家利益对国际社会产生的挤压是导致巴以冲突的祸根。另一方面,基于全球利益决定全球社会的原理,只有追求全球利益才会对解决巴以冲突产生最为健康的影响。基于追求全球利益的全球政治不断对国际政治的增加影响,也必将是巴以政局未来走向的关键性决定要素,巴以和平路线蓝图才会从根本上展现希望的曙光,因为在全球利益驱动下追求的是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路线。和全球利益相比,偏激的民族国家利益是一种自私,因为全球利益就是对全球都有益的利益,是一种全球大公,是对偏激的民族国家利益的超越。

当然,依靠全球利益来解决巴以冲突的道路还很漫长。理由有三:其一,全球利益是从解决全球公害、全球问题开始的。巴以冲突的影响虽已超越了地域界限,但仍属地缘政治范畴。有的学者提出“所谓全球问题,就是指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一系列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sup>⑤</sup>全球问题对国际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将“掀起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一场

①④ 蔡拓《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第251页。

② 蔡拓《全球政治的要义及其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

③ 蔡拓和俞正樑分别在其代表作《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和《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中,多次提出了这种观点。

⑤ 蔡拓《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第105页。

大变革”。<sup>①</sup> 全球问题的外延十分广阔,包括生态恶化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水与石油等资源短缺问题、跨国犯罪问题、网络犯罪问题、贩毒吸毒问题、艾滋病传播问题、核武扩散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人口激增问题、难民问题、移民问题、国际人权问题、金融危机问题、恐怖活动问题、民族宗教问题、走私问题、海盗问题,等等。由此形成生态政治、气候政治、毒品政治、核武政治、民族政治、宗教政治、资源政治、地缘政治、跨国政治、人口政治、人道主义政治等<sup>②</sup> 全球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以及人的自身精神信仰价值问题。和这些全球问题相比,巴以冲突只能是地区性民族宗教问题或地缘政治问题。其二,解决全球问题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公益组织力量。目前,联合国、非政府公益组织的力量还远远不能与国家的力量分庭抗礼。以色列一再违反联合国要其归还巴方被占土地的相关决议,美国一再放任之,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三,追求全球利益只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种趋势,还远未演变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即国家主权为大的主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把解决全球问题、追求全球利益进展到或落实到解决巴以冲突问题层次的路途还很遥远。

其实,基于利益展示人权行为界限的人权原理,<sup>③</sup> 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展示着人权在群体利益方面的三个存在向度或三个表现形态的界限张力,而巴以冲突不过是人类在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犹太教文明等在中东“咽喉”地带会聚、摩擦、冲突等互动的必然产物。从三重利益张力的视角看,巴以冲突必然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三重利益在中东“咽喉”地带的交织而引起的特殊地缘政治的结果。

总之,巴以冲突承载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大苦难,巴以地区的苦难不可能也不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因为追求全球利益的全球政治为解决诸如巴以冲突问题毕竟提供了希望的曙光。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犹太人问题。<sup>④</sup> 最后依笔者看来,在当代,只有建立在追求全球利益的基础上,巴以冲突问题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oots and future trends of Palestine-Israel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roots are the double disaster of geo-ethn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power politics. In the future, there is bound to be a three-pronged solution: geo-ethn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power politics and global politics. On the one hand, the Palestine-Israel dawn of peace can not rely on the national standpoints of their own and the great powers; on the other hand, on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global politics, can the Palestine-Israel relations avoi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ethno-national politics. The key to solve such a global problem is transcending ethno-national limitations and considering global interests.

(曹兴,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政管学院,北京,100088)

(责任编辑:罗 薇)

① 俞正樑《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第145页。

② 李东燕在《全球政治与全球问题研究的兴起》(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9期)已经提出相关问题,但忽视了民族宗教问题。

③ 万俊人总结道“人权实际上不过是权益或利益的范围界限:所谓权利或人权,实质上是指行为主体所具有的能够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的行为界限。”详见万俊人:《寻求全球普世伦理》,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21页。

④ 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中对此论述极为精彩。其根本点是要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转变。